

金戈铁马八百秋——古代巴人军事研究

刘 丹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其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楚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与北方的齐鲁、三晋、秦陇等中原文化交流融合，如同“满天星斗”共同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

一、巴之发展历程

巴蜀由来古，殷商已见传。巴人、巴族、巴地、巴国从内涵和外延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

从族群看，史学界均认为早期数巴并存，但在起源、发展等方面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如：徐中舒认为巴为江汉诸姬之一；蒙文通、蒙默等认为先秦至少四个巴国，秦灭的是姬姓之巴，楚灭的是枳巴；邓少琴认为白虎之巴、巫诞之巴、太皞之巴是不同的族群；缪钺提出廩君巴与板楯巴不同族，廩君化为白虎，板楯蛮则以射白虎为事；李绍明认为广义巴人包括“濮、賨、苴、共、奴、獯、夷、诞之蛮”，狭义则指巴国王室，其源可追溯为濮越、氏羌人。

从名称看，孔子修《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强调正统观、夷夏观以“正名定分”，巴人被夷化、多被称蛮，如以居处之地而称“五溪蛮”“巴郡蛮”“涪中蛮”等，以崇拜图腾称“白虎夷”“弼头虎子”等，以其祖宗之名而称“廩君蛮”，以其狩猎工具而称“板楯蛮”，以其赋税而称“賨人”。

从地域看，胡厚宣认为巴在殷之西北；唐兰认为巴在西南，武丁之世，西连巴蜀；顾颉刚认为早期巴族分布在汉水流域。在武丁征讨巴方后，逐渐向峡江地区、嘉陵江流域迁移，“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夔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覆盖了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和嘉陵江、渠江、汉水、清江、沅水、乌江等“三山六水”。“巴蛇吞

象”的传说，表明巴人曾远涉洞庭湖，并战胜了象图腾的本土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为平息西部巴人暴动，多次将其迁移到东部西阳（今黄冈）形成了“五水蛮”，巴人为怀念故土而命其河名巴水。

从习性看，巴人具有独特的劲勇尚武、信鬼事巫、架木为居、制盐酿酒、图语文字、巴氏器具、图腾崇拜、锐气喜舞、频繁迁徙、船（悬、岩）棺丧葬等十大显著特征。巴地山高林密、阴冷潮湿、瘴气弥漫、疾病流行，故巴人对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利用较早。茶“其味辛、性热，饮之疗风”，芳蒻（魔芋）能消肿、攻毒，巴戟天能壮筋骨、法风寒，花椒能温中、去寒、驱虫，黄芥、茱萸辛辣刺激（辣椒是明末才传入中国的），姜能散寒、御湿，形成了巴地人民麻、辣、咸、鲜等基本口味。

二、战争起源分析

据考古证明，最早在公元前 21 世纪的原始社会后期，部落间因互相争夺生存地域而引发了战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掠夺经常的职业了。”巴国为占有并扩张国土，必然通过战争来掠夺更多资源。

从生活资源看，巴地物产极为丰富，仅《华阳国志》列举纳贡之物就有 18 种之多，更有果实之珍者、药物之异者、竹木之贵者；同时，嫫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被后世尊为“先蚕”（蚕神），巴地栽桑养蚕织成丝绸，麻织粗布、苧织细布（苧布），巴人衣食无忧、生活富足。

从矿产资源看，巴地铜、煤等资源丰富。华莹山原名“铜梁山”，隋代置铜梁县。巴地墓葬青铜器具众多、纹饰精美，反映了巴人高超的冶炼技术。

从经济资源看，巴人长于工商，居地利之便而集天下财富。一是丹砂，即汞矿。《说文解字》释曰：“丹，巴、越之赤石也”，今普查西南地区汞储量约占全国的 57%。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

女怀清台”，可见巴人垄断丹砂获得了巨额财富。二是酿酒。巴地酿酒历史悠久，“巴乡村村人善酿酒，故传称巴乡清”；秦巴会盟“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表明，清酒在秦地极受尊崇，与祭祀的黄龙等值。今天孕育了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等名酒的“白酒金三角”区域，正是历史上的巴地所在。三是制盐。有盐则国富，峡江地区盐泉、盐井众多，盐就成了巴人的富国物资。巫载民（巴人）何以“不绩不经”而“服”、“不稼不穡”而“食”？自是占据盐利，构建了四通八达的巴盐古道。当然随之而来的不仅有繁荣，还有残酷的战争。巴以盐而兴，也因盐而亡。

三、巴之战事概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纵观每一民族发展史，既需为政以德、以文化之，也要居安思危、武事辅保。《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尽管战国时期“合纵连横”将军事与外交有机结合，但最终秦还是以战争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一）夏朝时期。“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表明巴、蜀认同夏的盟主地位并积极融入华夏。《山海经》载“西南有巴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竹书纪年》也有“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的记载，表明夏为加强控制、镇抚南土，有效掌握了巴地的神权和裁判权。

（二）殷商时期。巴人受夏“亡国”之累，频频受到商王朝的军事打击，到武丁时期达到高潮，从已发掘的甲骨文看，至少有4次受到征伐：有从正面问卜的，“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𪚩伐巴方，受有又”；又有从正反两方问卜，“□□卜，□，贞王佳妇好令沚𪚩伐巴方，受有又。贞王勿佳妇好从沚𪚩伐巴方，弗其受有又”，均是占卜询问讨伐巴方是否会受到上天的保佑。殷王武丁和王后妇好统率沚𪚩等将领，设立埋伏圈围攻巴方，这也是有史可查的最早伏击战。有文可证：“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𪚩伐巴方，王自东受，伐东阱于妇好立。”“贞，妇好其从沚𪚩伐巴方，王勿自东受伐东阱于妇好立”，全辞正反两问。武丁还“命令妇

好率兵伐羌方，亦伐巴方”。可见巴方“负固不服”，敢于“不享”、“不王”，故武丁、妇好率沚戡讨伐巴方。此处的巴方，就是《太平寰宇记》《四川通志》等地理方志记载的“山南古巴国”“山南即古巴国”“小巴（山）之南为古巴国”。

（三）周朝时期。在周武王召集八百诸侯会孟津的讨纣大军中，巴师勇锐、前歌后舞，导致殷人前徒倒戈、大败而逃，“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分封建国以屏藩周室”，巴子国由此建立。

至春秋战国，王室衰微、诸侯坐大，争斗不息、杀伐不止，巴是东与楚战、西与蜀攻、北与秦斗，四处出击、鏖战群雄。从史籍记载看，鲁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巴曾远伐邓（今河南邓州），公元前688年巴楚联军伐邓、伐申，“楚子惊巴师”强悍的战斗力，巴楚联盟破裂，双方在江汉平原、峡江地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事角逐。鲁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巴伐楚地那处，克之，楚文王也因之而病死。鲁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巴、秦、楚三分庸国。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败于鄆，其后巴沿长江西迁、嘉陵江北退，故“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巴虽想朝秦暮楚，但秦楚均有吞并之心，随着国力日渐衰退，“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

（四）秦朝时期。秦历“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公元前650年左右，秦穆公用百里奚为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内修耕作、发展生产，外事兵戎、开疆拓土，自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至始皇嬴政方一统天下。

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巴国时都于阆中，与葭萌水陆畅通，且苴侯分封已久，与蜀王日渐疏远，反与巴王为好。而巴蜀世战争，因此蜀王大怒伐苴，苴侯奔巴，巴求教于秦，殊不知是引狼入室。而秦“素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故于“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

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冬十月，蜀平”，“仪贪巴、苴之富，执王以归”。这表明，以阆中为国都的巴国正式消亡。

秦一统巴蜀后加强开发和更化，一方面，废分封、行郡县，“置巴、蜀、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在江州、阆中、成都等地高筑城池，形成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中央任命郡守、县令，强化中央集权。另一方面，通过以巴氏为蛮夷君长的代理统治、“世尚秦女”的和亲联姻、“爵比不更”和以爵抵罪的爵赏特权、以货币和实物赋税的优厚政策，同时以“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注重柔性管理，增强心理认同，辅之大量互相移民，推动巴蜀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枳巴灭亡时间稍晚，《战国策·燕策》载“楚得枳而国亡”，指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郢，说明在此之前楚已灭枳巴。“昔楚襄王（前 298 年—前 263 年在位）灭巴，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巴人余部流入酉、辰、巫、武、源等五溪，号为五溪蛮。

公元前 223 年，秦王政发巴蜀之师顺江而下、一举灭楚，于公元前 221 年一统六国。

四、巴人兵器

从小田溪、宝轮院、冬笋坝、罗家坝等巴人遗存考古发掘看，凡男子墓葬均有兵器，可见巴人生前“全民皆兵”。巴人兵器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数量大，每个发掘现场均有出土；二是延续久，贯穿商周秦汉时期；三是种类多，既有攻击性、防御性兵器，又有指挥、生活用具；四是纹饰奇，有虎、鸟、手心、花蒂、水波、云雷、饕餮等各种纹饰和特异符号，统称巴蜀图语，目前尚未完全解读。

（一）攻击性兵器。其组合多以剑、矛、箭等为主，为巴军士卒单兵的基本装备。

1、剑。柳叶剑最具巴氏特色，剑身细长、扁茎无格、茎身同铸，茎上有两个圆穿，可用木竹片夹住固定。小田溪出土一组八件、金口河出土一组七件的柳叶剑，最短仅为 28.4 厘米，“一寸短一寸险”，便于近身搏斗。

2、弓弩。小田溪墓曾出土弩机三件，铍有双翼、三棱式。巴人善射，秦昭襄王时有白虎之患，募巴郡板循蛮射杀后，嘉之曰“一朝患除，功莫大焉”；后有“板楯七姓，以射虎为业，立功先汉。”

3、矛。分长骹、短骹两型，矛身呈叶状、有宽窄两种，骹上有弓形耳为特征。

4、戈。呈三角形，装木秘，有长短二式。长柄戈、矛双手持用，短柄戈、矛单手持握，另一手则持盾护身。

另有钺、戟、刀、斧等兵器，总体相对较少。

（二）防御性兵器。主要包括甲冑、盾。

1、甲冑。巴人多用皮革和藤条制成。在小田溪曾出土铜质冑顶两件，应为指挥者所佩戴。

2、盾。巴人因地取材，多用木盾。在城固出土大量木制板楯，呈梯形，上小下大。“板楯蛮以木板为盾”，后遂成为族称。

（三）指挥用具。为鐃于、钲。巴地崇山峻岭，指挥军队进退行止，不能采用中原旗帜号令形式，故以金属鸣击为号。

鐃于，本乐器也。《国语·晋语》说：“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鐃于、丁宁，儆其民也”。郑玄《注》：“鐃，鐃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巴人将鐃于与图腾崇拜结合起来，其顶部中央铸有仰头张嘴、锯牙翘尾的虎形钮，虎纽鐃于则成为巴文化的典型器物。

（四）生活用具。主要有青铜鼎、釜、釜、甗、甗、敦等生活用具，在罗家坝、小田溪等地都有大量出土。

五、军队建制及兵种

巴地山水纵横、沟壑交加，不便车马通行，墓葬发掘尚未发现车器马具，故巴师应为善于近战的步战短兵，而无车兵和骑兵。另一方面，巴人善舟楫之利，从宝轮院、罗家坝、冬笋坝、小田溪等船棺葬发掘看，应有水师。《史记·苏秦列传》有“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记载，北人不善水战，故司马错、田真黄向秦惠王建议，

“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

巴军曾与蜀、楚、秦多线作战，并能长途奔袭，其应有成熟的建制和严格的管理。否则，虽巴人“天性劲勇”，也不可能发挥其战斗能力。摩尔根认为，氏族部落发生战争时，氏族首领用举行战争舞蹈的方式宣布计划并征集人员，当一个部落受到攻击的威胁时，也采取同样方式组建战斗队伍来应战。“前歌后舞”的巴渝舞，“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既是一种战斗舞蹈，也应是一种战斗队形，既可以迷惑对方，更为自己加油助威，便于冲锋陷阵。

六、军事据点

夏朝时期，巴地战争尚不可考证。殷商多次征讨江汉巴方。春秋战国时期，巴东接楚、邓，北比中原，西临蜀，南近夜郎，其间多次发生战争。

（一）北线。“周匡王二年（公元前 611 年），巴、秦、楚灭庸，其地分属秦、巴”，汉中盆地东部归楚、西部归秦、中部归巴。故巴之北线，兼具防楚、抗秦之功能，其主要据点为沔关和葭萌关。关作为古代冷兵器时代的军事要塞，大多设在地势险要处，方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沔关。汉水“始源曰沔，故曰汉沔”，沔关设置于汉水上。汉中南扼巴蜀、北瞰秦川、东下楚湘，巴、楚、秦均视为要害，“恒成争地”。在城固发掘大量的戈、钺、斧商代青铜兵器，表明城固亦为军事重镇。

葭萌。今四川广元昭化，为巴蜀门户、兵家必争之地。20 世纪 50 年代，在宝轮院发掘大量巴人船棺葬，可推测当时巴人在此驻有重兵。

（二）东线。巴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东面的楚国，其间横亘着巫山、七曜山等，攻伐多从水路进行。“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因而三关都筑于江边，形成节节抵抗之势。

扞关。其具体位置，徐广认为扞关在鱼復；张守节认为在硤州巴山县界；《后汉·郡国志》“鱼復县”条载“扞水，有扞关”；《清一统志》谓清水为扞水，谓扞关在长阳县。结合当时楚已据有巫山盐泉的情况看，此处所谓扞关为巴人为防楚入侵而设，应在瞿塘峡西口的白帝城。

阳关。阳关之“阳”，乃江之北、山之南。巴先失巫，故置扞关于鱼

復，待楚得枳后，巴退守铜锣、明月、鸡鸣三峡，铜锣峡更为险要。后来三国时邓芝、元末明初大夏国明玉珍、明末张献忠，都据此作为要塞。

弱关。《江水注》载“捍关，廩君浮夷所置也；弱关，在建平、秭归界，昔巴楚数相攻伐，借险设关，以相防捍”。捍关，今考在奉节；弱关在今秭归县，即瞿塘峡、巫峡所在之地。

（三）西线。巴后期不断西迁，与蜀大体以涪江为界。

夔道。今宜宾。地处巴、蜀、夜郎、滇等交界，鸡鸣三省之地，可顺长江而下江州。故各方势力犬牙交错。

阆中。作为巴国后期国都，自是军事重镇。秦灭巴后，张仪更在此筑城，以加强统治和管理。

（四）南线。巴曾“南极黔涪”，黔水即乌江，涪水又称巴涪水，今赤水河。

枳。“涪陵郡，巴之南鄙”，其地势险要，地处长江、乌江汇合之口，东连云万、西控成渝、南屏滇黔、北锁汉中。小田溪墓葬出土了错金编钟、带“王”的钲，应为王侯级礼器，故巴“先王陵墓多在枳”。作为巴王陵所在地，自是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巴县。20世纪50年代在冬笋坝发掘了大量船棺葬，说明此处也是巴人军事据点，应兼具防蜀和西南夷的双重功能。

七、军事将领

巴人英勇善战、精武尚武，《华阳国志》《三国志》称“巴师勇锐”“巴人劲勇”“种类刚猛”“刚勇好舞”“锐气喜舞”“其人勇猛，善于兵战”，赞誉“巴有将，蜀有相”。

廩君。自秦汉以后，巴为廩君之后大为流传。西汉刘向《世本·氏族篇》云：“廩君之先，故出巫诞”，南朝（宋）范曄《后汉书》也有掷剑为君的记载，多有神话色彩，可作为研究参考。

巴蔓子。“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蔓子不能割城相让，只得自刎以头相谢，楚王“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蔓子将军应变以权是智、自刎授头是勇、杀身偿

城是信、舍身爱国是忠，谱写了慷慨壮丽的悲壮之歌。

范目。汉高祖刘邦灭秦后，被项羽封为汉王。“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寔民。要与共定秦”，范目募集七姓子弟随高祖平定三秦，后三次封侯，“目复请除民罗、朴、咎、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

李虎、李特、李雄。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平定汉中，李虎率五百家巴夷、寔民归之。建安二十四年刘备攻占汉中，曹操将李虎、七姓夷王朴胡等巴人北迁略阳，散布于秦陇，因与氐人杂居，故称巴氐。西晋末年，秦、雍氐羌反，“北地巴人”在李特领导下就食汉中、南下益州。李雄于永兴元年（304年）十月在成都称王，306年6月称帝，国号大成；李寿于338年即帝位后改国号为汉，永和三年（347年）三月被桓温所灭。

冯焕、冯緄。父焕曾主持对朝鲜半岛的军事征伐，其故里渠县有“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君神道”阙。子緄于延熹五年（162年）南讨叛贼，“虽授丹阳精兵，亦倚板楯”攻破武陵蛮夷、平定荆州，永康元年（167年）去世，谥桓侯。

严颜。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沿长江进攻巴郡，擒获守将严颜，飞曰：“大军至，何以不降，敢逆战？”严答：“卿等无状，侵夺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飞大怒命将严颜砍头，颜对曰：“砍头便砍头，何为怒邪！”飞遂释放并以为宾客，后未见于正史。

王平。字子均，初为曹操的牙门将军，后降于刘备，备大喜：“孤得王子均，取汉中无疑矣”。后随诸葛亮南征、北伐，街亭之战力劝马谡不从，亮曾感叹“肯亲冒矢石，真忠臣也！”陈寿评价曰：是时，王平在北，马忠在南，邓芝在东，咸著威绩。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三国时期孙吴名将。孙权曾说：“孟德有张辽，孤有甘兴霸，足相敌也”，被陈寿盛赞为“江表之虎臣”。

句扶。字孝兴，巴西郡汉昌县（今四川巴中）人。三国时蜀汉名将，多次南征北伐、战功累累，官至左将军、宕梁侯。时人语曰：“前有王（平）、

句(扶),后有张(翼)、廖(化)”,《华阳国志》《三国志》赞曰“称美荆楚”“忠勇宽厚”。

张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国人。北讨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蛮夷,诱以恩信,蛮夷皆服。陈寿赞其“识断明果”。

程畿。字季然,巴西阆中人。刘璋时为汉昌(今巴中)长,有大义,后迁江阳太守。刘备领益州牧时,辟为从事祭酒,随先主征吴而亡。陈寿赞曰:“江阳(程畿)刚烈,立节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单夫只役,陨命于军”。

八、主要作用

纵观中国历史,巴人及其后裔几乎参加了缔造中华民族及其历次大统一的重大军事活动。潘光旦先生曾高度评价:“唐代以前,历史上为了统一祖国而进行的若干次成功的战争中,几乎都有巴人参加。”

(一)认同融入华夏。据史籍和考古,夏的地域范围在晋南豫北,因而丹山不可能有夏启之臣孟涂“听其狱讼,为之神主”,但从侧面反映了巴地对华夏族群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

(二)助武王伐纣。纣王无道,武王召天下共讨之,巴人以特殊战功在分封中爵之以子。成王大会诸侯于东都洛阳,“巴人以比翼鸟”贡献宝物,表明巴认同并维护周的天下共主地位。

(三)助秦统天下。公元前316年,秦以“蜀苴相雠”契机伐蜀攻巴,将巴蜀纳入秦之版图。公元前223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巴蜀为秦灭楚、一统天下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助刘邦兴汉。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丞相萧何献谋“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一方面,竇民“天性劲勇,初为汉先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另一方面,更为战争提供坚强的后勤保障,“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可见,巴人作为刘邦还定三秦的先锋部队,功勋卓著,名留青史,且巴人

歌舞“巴渝舞”也纳入了中原汉乐府文化体系。

（五）助汉室一统。为维护和平统一，巴人多次远涉淮南（今安徽）、夜郎（今贵州）、南越（今两广）、越巂（今四川攀西、云南北部）、滇（今云南）等地参与平定叛乱，如：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七月，淮南王布反，上乃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

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帝乃拜（唐）蒙中郎将，发巴、蜀兵千人，奉币帛见夜郎侯，喻以威德，为置吏”，将夜郎国纳入汉一统管理；

元光五年（公元前 130 年）夏，“发巴蜀治西南夷道”；

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秋，汉发巴蜀罪人伐南越；

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洸、靡莫，以兵临滇；

王莽时期，夜郎反，“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广汉、巴、蜀、犍为吏士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

东汉中期，西方羌人东进，边关不宁、朝野震惊，曾经多次征发巴人参加讨伐。在公元 108、110、115、148 年，羌人数次攻入汉中，均赖征发板楯蛮人以讨平之。

（六）助三国归晋。汉末大乱，雄杰并起，三国鼎立。“（景耀）六年（刘禅年号，公元 263 年）春，魏相国晋文王命征南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五道伐蜀”，“（咸宁五年，公元 279 年）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春三月，吴平”，三国归晋，天下一统。

九、忠勇信义的巴人精神

巴人沐风栉雨、筚路蓝缕、砥砺前行、骁勇善战，形成了忠勇信义的巴人精神。

（一）忠，于国家讲忠诚。每逢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关头，巴人都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勇当先锋。从助武王伐纣、汉高祖平定三秦，到川军抗战等，都充分展示其对国家的忠诚。

（二）勇，于征战讲勇武。巴地山地连绵、江河纵横，巴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争于气、重于力、尚于武，形成了“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竇旅，玩之则渝舞”的坚毅果敢、顽强劲勇、勇敢善战的性格特征。

（三）信，于交往讲诚信。秦巴刻石为盟要，范目和汉高祖“要与共定秦”，体现对等的契约精神，且双方信守承诺。蔓子将军以死殉信、自杀成仁，体现了光明昭若日月的信义之光。

（四）义，于社会讲道义。巴人积极充当“统一”战争的急先锋，具有征讨暴戾、“替天行道”的“道义”性质，自古号称“义民”。如《华阳国志》就盛称“其（巴）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有先民之流”“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

正是由于巴人“忠、勇、信、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浸染和传承，在这方土地后来又诞生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伟大川陕苏区精神。

结语：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依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既要清醒“国虽大，好战必亡”，更要牢记“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既文明其精神、又野蛮其体魄，大力传承弘扬巴人精神，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